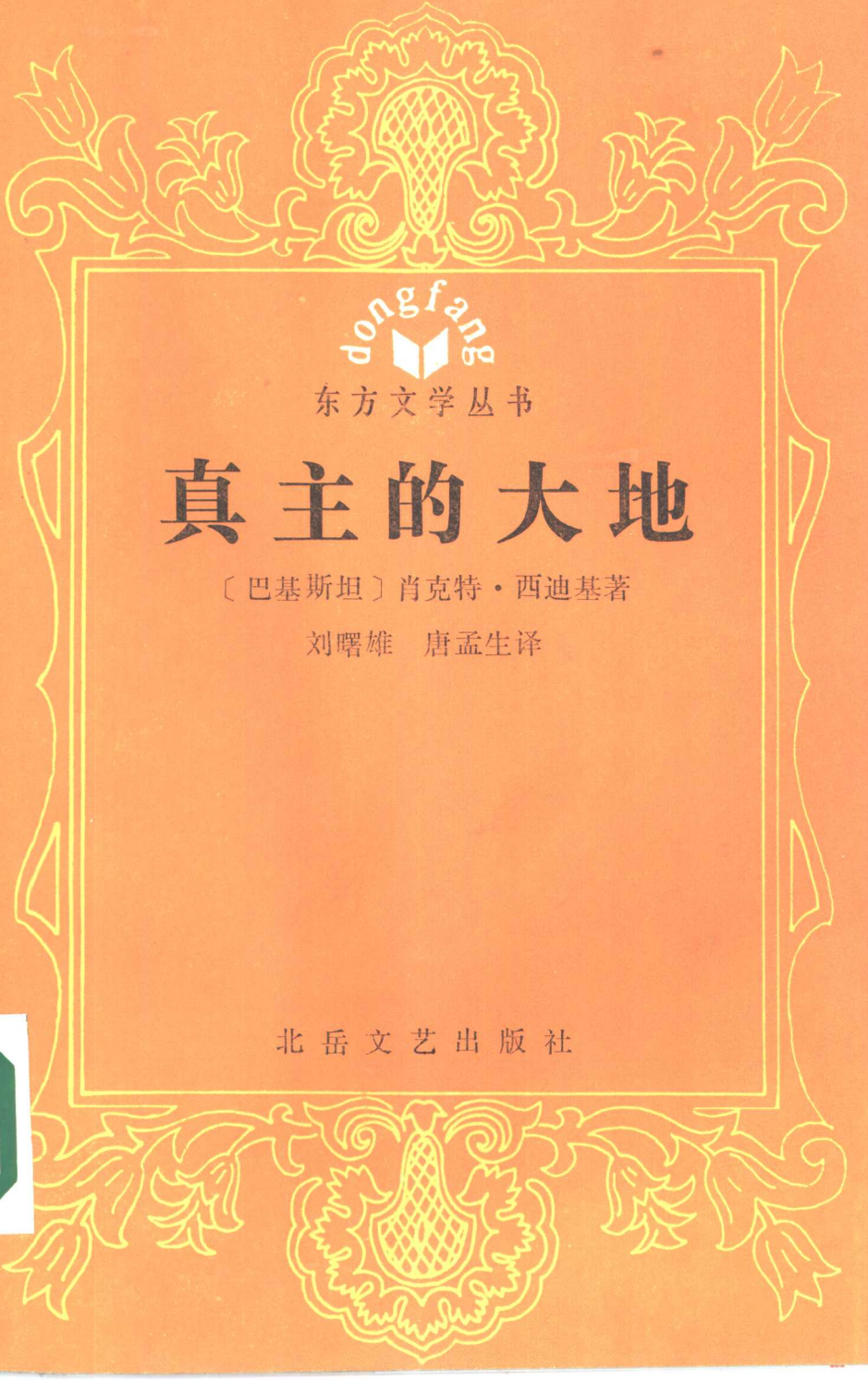




dongfang

东方文学丛书

真主的大地

〔巴基斯坦〕肖克特·西迪基著

刘曙雄 唐孟生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学丛书

真主的大地

〔巴基斯坦〕肖克特·西迪基著

刘曙雄 唐孟生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真主的大地

【巴基斯坦】肖克特·西迪基 著

刘曙雄 唐孟生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大32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625 字数：340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10397·83 定价：2.80 元

译者前言

乌尔都语长篇小说《真主的大地》是巴基斯坦著名作家肖克特·西迪基的代表作。它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一经问世便在巴基斯坦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密切关注。一九六〇年，经巴基斯坦全国作家会议推荐，获全国最高文学奖——阿达姆吉文学奖。迄今为止，《真主的大地》在国内已再版七次，并被摄制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放映；在国外，则被译成了十八种文字出版，赢得了无数读者。

肖克特·西迪基一九二三年生于印度的勒克瑙。他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记者和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西迪基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南亚次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他目睹了本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严峻斗争，亲身经历了巴基斯坦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巨大变革。因此，他对历尽苦难的巴基斯坦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对新生的共和国怀着无限的期待。独立后，他作为一名记者，有机会接触巴基斯坦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特别是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捍卫共和国的独立，反映民众的要求，变革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这一切便成为他投身到进步文学运动中去强大动力。多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辛勤写作，获得了累累果实，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真主的大地》、《红色的荷花》、《龙卷风》，短篇小说集《第三个人》、《夜深沉》和《夜晚的

城市》等。其中，《真主的大地》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被称为“煤油灯下之作”。

一九四七年，次大陆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将英国殖民主义者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诞生，为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千里迢迢迁移而来的伊斯兰教徒带来了希望，他们渴望从此摆脱贫困和愚昧，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但是，政府机器和经济命脉仍然操纵在少数封建主和大资本家手里，广大人民仍处在无权和贫困的境地。在城市，新生的资本家、暴发户和富商大贾纷纷涌起，相互倾轧，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国际上，帝国主义分子为了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加紧渗透、寻找和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进行幕后操纵，接二连三地更迭政府。从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实行议会制的十一年中，中央政府四易总督，七更总理。这期间，在建立巴基斯坦的斗争中起过巨大作用的穆斯林联盟完全失去了政治地位，这一政治空缺使全国的动乱局面无法收拾。最后，全国实行了军事管制。

巴基斯坦独立初期，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但其经济仍然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巴基斯坦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89%，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贫富相差悬殊。如在自耕农较多的旁遮普省，68%的土地掌握在12.8%的地主阶级手中。在信德省，5%的地主占有87%的土地。^①一九五〇年虽进行过租佃改革，但只是对地租进行了最低限制，根本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地主仍然占有大量的土地。国内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独立时几乎没有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轻工

① 《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14页。

业主要是对农业原料（如棉花、黄麻、甘蔗）的加工工业，采矿、造船工业等都处于依赖外国资本的地位。此外，巴基斯坦先后加入了由美国控制的一些军事条约组织，军费开支增大，经济上不得不进一步依赖美国。财政、金融都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

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民众仍然在穷困、饥饿和瘟疫中挣扎。作为社会最敏感的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提出了改革社会的要求。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们则投身到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之中，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民众的痛苦，并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于是，《真主的大地》便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巴基斯坦进步文学的优秀代表作。

《真主的大地》反映的是城市生活。在某一城市居住着拉齐雅一家。她早年丧夫，与女儿苏尔达娜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诺夏和阿努一起过着无依无靠、朝不保夕的生活。长子诺夏先在一家摩托车修理厂当童工，后被解雇，随流浪儿拉贾离家出走，在卡拉奇被拐卖到一个盗窃集团。在拉齐雅一家生活没有指望时，商人尼亚兹乘虚而入。他为了占有年轻美貌的苏尔达娜，先是娶拉齐雅为妻，为她在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后又与私人医生海拉特勾结，以治病为名使她慢性中毒而死。狡猾贪婪的尼亚兹既获得了一笔巨额人寿保险费，又占有了苏尔达娜。尼亚兹还与新任市政委员会主席汗·巴哈杜尔狼狈为奸，倒卖质量低劣的毛毯给政府以救济灾民，并在承包房屋建筑中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真相暴露后，正当汗·巴哈杜尔企图为保住自己而毒死尼亚兹时，一直流浪在外的诺夏回到家乡。他得知母亲被害、姐姐被占、弟弟被逼走的情况后，杀死了尼亚兹。法庭以谋杀罪判处诺夏十四年有期徒刑。汗·巴哈杜尔为了霸占尼亚兹的财产指使心腹强行逼走苏尔达娜。苏尔达娜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到了阿里·艾哈迈德的

同情，在“云雀社”安下身来。

“云雀社”是由一些知识分子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福利组织。它旨在改革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提高群众觉悟，并在此基础上兴办教育、卫生等群众福利事业。由于它代表了群众利益，所以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以汗·巴哈杜尔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先是以金钱收买利诱，后又企图施用暴力摧毁它。但在以阿里·艾哈迈德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云雀社”得以生存和发展，终于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西迪基以拉齐雅一家人的生活遭遇为主线，概括而又生动地反映了独立初期巴基斯坦城市生活的面貌。在作者的笔下，既有波澜起伏的群众活动场面；又有斐然若画的生活小景；既有曲折迭宕的故事情节；又有细致逼真的心理描绘。全篇首尾连贯，脉络清晰。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塑造了一组活生生的艺术群像，而其中的主要人物，无一不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有可歌可泣的抗争者；有迷途知返、追求光明的探索者；有苦苦挣扎、令人怜悯的受害者；有机关算尽、伤天害理的食人者。对丑恶的，作者无不竭力加以揭露和鞭挞；对美好的，作者无不热情给予歌颂和赞扬。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群丰富多姿，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通过他们窥见当时巴基斯坦城市生活的全貌。

作品中的苏尔达娜是个美丽、善良、憧憬美好生活的姑娘。可是，由于家庭生活的贫困，她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社会剥夺了她自由恋爱和参加工作的权利。相反，美丽、善良和纯洁却变成了她屡遭不幸的直接原因。在性格上，她固然有温良脆弱的一面，但比起母亲拉齐雅来，她还有坚强和抗争的一面，这是十分可贵的。她敢于向大学生索里曼表达爱情，在关键时刻甚至能冲

被世俗的偏见，深夜到云雀社去找索里曼；在尼亚兹企图霸占她，汗·巴哈杜尔一伙百般欺凌她的时候，她也尽了最大努力来卫护自身的权益。但是，在邪恶势力的包围中，一个身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弱女子，终究摆脱不了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命运。她沦落了，成为富人手中的玩偶。一切美好的梦都破灭了，求生生不得，求死死不得，走投无路，进退维谷。在饱受艰辛，身陷绝境之际，是云雀社收留了她，给了她学习文化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只有在这时，她的生活之树才重新返青，她的聪明才智才开始表现出来。苏尔达娜是当时巴基斯坦社会下层妇女的典型代表，她和书中其他几位妇女，如拉齐雅、瑟戈腊等一样，都属于同一个阶级，在遭遇上也有着共同之处。遭贫困、受歧视、被损害、被愚弄，几乎成了她们的共同命运。作者通过对苏尔达娜等妇女形象的塑造，向读者揭示了两条深刻的道理：妇女经济地位的低下，是她们成为剥削阶级的猎取物和践踏对象的终极原因；封建道德规范是社会下层妇女的无形禁锢，是她们遭受灾难的精神原因。因此，要解放妇女，就必需改革社会，一方面要同剥削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取得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要兴办教育，移风易俗，取得文化地位，打碎精神枷锁。云雀社所进行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作者对苏尔达娜心理和言行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对她寄予的由衷同情，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方面的性格和感人至深的魅力。使读者的心情随着她的遭遇而产生共鸣。这是作者塑造的第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

苏尔达娜的弟弟诺夏是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少年。他在贫困中诞生，在痛苦中长大。他当过童工，受到工厂老板的毒打；当过扒手，受过盗窃集团头目的折磨；坐过监狱，受过非人的待遇；他杀过人，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他有聪慧的天资，但

却不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有健壮的体魄，但却不能挣钱养活自己；他有改邪归正的强烈愿望，但却摆脱不了黑社会的魔掌。作者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发人深思的。书中还描写了几个与诺夏年龄相仿的少年，如拉贾，在被家庭遗弃以后，长年流落街头，行乞行盗，终于患麻疯病而躺倒路旁。再如沙密，从小当报童，长大当车夫，最后身染痲病，无钱医治，在破屋的一角下坐以待毙。再如阿努，被尼亚兹赶出家门后，流离失所，形容猥琐，堕落成游街串巷的行尸走肉。他们所走的道路虽不尽相同，但结局却是同样可悲的。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年，在新生地的“真主的大地”上，没有欢乐，没有幸福，相反却成为贫穷、饥饿、疾病和罪恶的牺牲品，形成了一代少年的悲剧！这是作者对社会的无情揭露和针砭！

大学生索里曼是一个正直而富于同情心的青年。他对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有改革社会的要求。然而，他并不是个坚定彻底的改革者，在他的身上充分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一方面，他对现实不满，疾恶如仇，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积极参加云雀社的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经不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在生活中走了一段弯路。在云雀社工作期间，他凭着正义感和同情心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在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他便立即陷入了苦闷，情绪低落，甚至离开了云雀社。在爱情问题上也是一样，他真心爱恋着苏尔达娜，但当苏尔达娜面临绝境，需要他挺身而出时，他胆怯了，后退了。后来，他终于屈服于家庭的压力，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结了婚，并找到了工作。他企图在工作中洁身自好，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安静。然而，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象他这样的正直青年是不可能靠个人奋斗闯出一条中间道路来的。要么与腐朽的恶势力同流合污，要么

受恶势力的排挤或宰割。他的命运是后者。最后，当他醒悟过来重新回到云雀社时，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似乎甩掉了长期束缚在他身上的锁链。这不能不说是他精神世界中的一次飞跃。耐人寻味的是，在他重返云雀社以后，却意外地发现自己从前的恋人苏尔达娜也在那里，而且已经同他所敬仰的人结了婚。这对他是一个新的冲击，也是对他叶公好龙式爱情的一个嘲弄。但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索里曼已经成熟多了，他在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经受住了这一次考验，终于成为云雀社的一名骨干。热情、积极、有理想，追求进步，这是索里曼性格的主导方面；而优柔寡断、忽冷忽热、动摇不定、有时甚至是懦弱则是他性格的辅助方面。正是这多方面性格的相辅相成，使索里曼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典型意义。

书中着力刻画的一个反面人物尼亚兹的形象，也是十分成功的。尼亚兹原是一家旧货店的老板，他老奸巨猾，为富不仁，敢于冒险，一心一意向上爬，终于成为一个拥有百万资财的承包商、暴发户。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尼亚兹的发家史正是对这种资本积累过程的生动说明。他得到的第一笔巨额资金是用拉齐雅的生命换来的。他之所以能够有汽车、洋房，能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是以广大灾民和房屋用户的生命为代价的。尼亚兹的每一根神经几乎都和金钱牢牢地拴在一起。他有喜悦，有愤怒，有快乐，也有哀愁，然而，喜怒哀乐无不围绕着一个“钱”字。为了钱，他可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为了钱，他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一旦有了钱，他的欲望便进一步膨胀，沿着

①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

罪恶的道路越走越远，终于钻进了自掘的坟墓。从尼亚兹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汗·巴哈杜尔是一个“开有几家工厂的老板，在旁遮普省和信德省拥有土地和财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地主兼资本家。后来，他用阴谋手段当上了市政委员会主席，使权力和资本集于一身。尼亚兹正是与这样一个人相勾结，充分利用他的权势，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资本。尼亚兹最终之所以在竞争中失败而成为汗·巴哈杜尔的替罪羊，乃是因为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只是依附于权力而没有攫取到权力。汗·巴哈杜尔之所以能在竞争中获胜，能把尼亚兹的资产吞并掉，是因为他的手段更残忍，更狡诈；是因为他懂得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如前所述，当时的巴基斯坦社会正处在动荡之中，动荡的时势对人民群众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而对那些投机家和冒险家来说，却是发财致富、向上爬的极好时机。尼亚兹和汗·巴哈杜尔之流正是这种投机家和冒险家的典型。他们作为书中反面人物的代表，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他们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剥削阶级的一切虚伪、丑恶的东西，因而也是作者竭力暴露、批判和鞭笞的对象。

书中，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社会，而且还提出了社会理想。小说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以阿里·艾哈迈德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为进行社会改良而作的努力。他们的组织“云雀社”虽说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组织，但是“云雀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如参加反对汗·巴哈杜尔的竞选，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帮助失业者安排工作等，无疑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云雀社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看到了民众的疾苦，自愿组织起来，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兴利除弊，改良社会，这种要求是积极的，可贵的；他们为自己的理想，为民众的

利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这种精神是高尚的，可敬的。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隐约地了解了一些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掌握它，没有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因而他们的行动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盲目性。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在复杂的形势中，他们中有人彷徨，有人落伍，有人颓唐，甚至有人背叛。这是他们自身的弱点造成的。从云雀社成员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影子，从云雀社的活动宗旨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社会理想。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云雀社的行动是不可能取得全面成功的，他们的行动对当时的整个巴基斯坦社会也不可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的要求，这种善良的愿望，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都是进步的，是值得赞扬的。其进步的意义在于，它们与民众的要求，民众的愿望，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也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社会理想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

总之，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真主的大地》都不失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佳作。它对后来的巴基斯坦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巴基斯坦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诚然，小说本身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些地方的描写显得过于烦琐，个别地方也还有材料堆积的痕迹等。但是，瑕不掩瑜，我们深信，这部作品一定能够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对我国读者了解巴基斯坦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状况将大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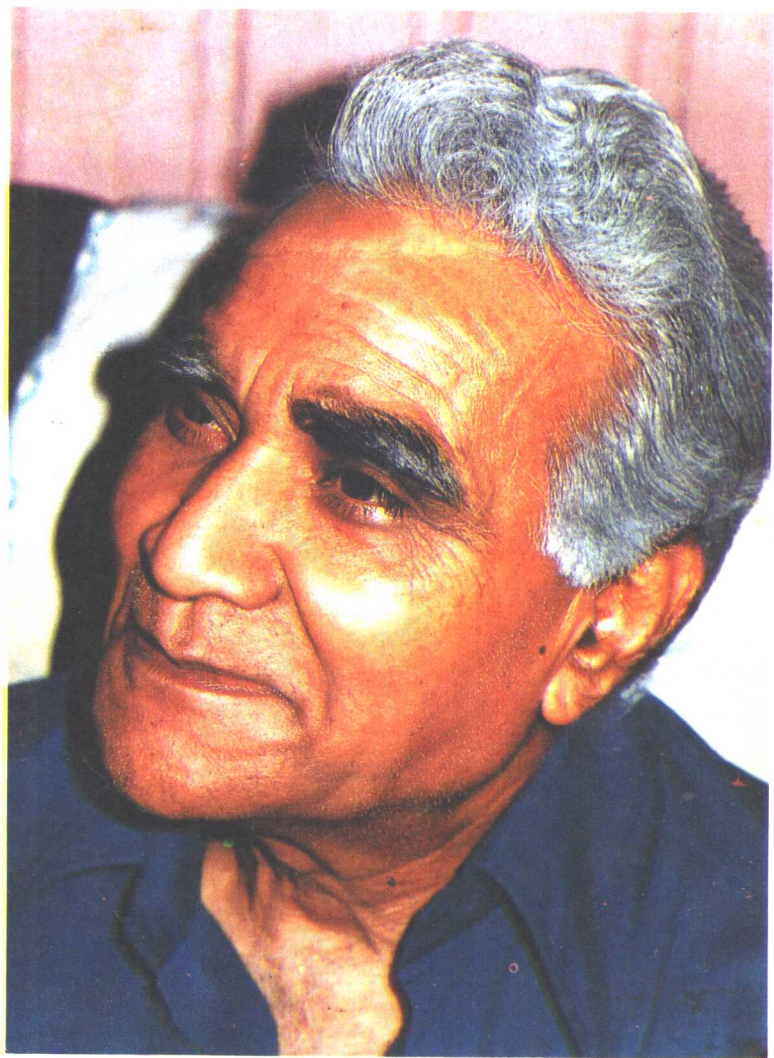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山蕴老师以及其他同志的热情帮助和鼓励，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根据巴基斯坦拉合尔文学明镜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本（第七版）、从乌尔都文直接译出。翻译中对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必有许多不当之处，亟望读者指正。

译 者

1984年10月



作者像

第 一 章



小巷拐角，市政委员会的煤气灯亮了。

住在这附近的一群孩子正坐在灯下玩扑克。他们中最大的要数拉贾，看外表就知道他是个流浪儿。长得虎头虎脑，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纱巾。在一片嘈杂声中只听他一声又一声地嚷着：

“你们看，我这宝押得怎样？”

“哎！我有张Q！哈哈，真走运！”

“小子，你听着！今天非让你输不可！”

他一直在赢。他的对手是沙密。沙密长得瘦小单薄，但性格倔强，尤其是那双眼睛给人以聪慧的感觉。这一次，正当拉贾偷偷地把藏在脚下的一张牌拿出来时，沙密发现了。他马上喊了起来：“看到了！看到了！你小子捣鬼。”

在他的抗议下，拉贾尴尬地笑了笑，接着就恶狠狠地说：“哼，我看你脑袋有毛病。”

沙密也不示弱，瞪起眼睛说：“你刚才从脚底下摸出一张牌来。”

拉贾还想撒谎，沙密一赌气就把手里的牌全扔了，气冲冲地坐下。

拉贾想逗他：“小子，一输牌就哭。”

沙密没好气地说：“你最会耍赖了，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

拉贾也有几分恼火，说：“干嘛不玩了？你得给了钱再走。”

沙密固执地说：“好吧！看哪个有狗胆敢拿走我的钱？”

拉贾生气了，恶狠狠地盯着骨瘦如柴的沙密，向他大吼：“哼！你瞧着！”说完就扑上去，一把抓住沙密的衣领。沙密想推开拉贾，结果衣领被撕破了。沙密又气又恨，哭丧着脸看着拉贾，猛地打了拉贾一个耳光。拉贾的耳朵里嗡嗡直响。他朝着沙密冲了过去，两个人抱作一团扭打起来。

一旁观看的孩子们骚乱了，在大声喊叫。他们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为拉贾助威，另一派替沙密鼓劲。沙密虽长得瘦小，但挺结实。拉贾先用脚把沙密绊倒，又一屁股坐到他身上，从上面压住他。但沙密从下面猛地一使劲，拉贾没坐稳，从他身上滚了下来。沙密趁势骑到他的胸脯上，用两膝夹住他的脖子。于是，拉贾只好认输，向沙密求饶。

这时，小巷里出现了一个黑影。黑影走到灯下，孩子们才看清楚是卡莱先生。他弓着腰，拖着沉重的步子朝这边走过来。孩子们一看见他便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卡莱先生！”

他停下来看了一眼，然后慢悠悠地来到孩子们跟前。他见拉贾和沙密还在厮打，就骂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两个人的衬衫都撕破了，脸上满是尘土，嘴象风箱一样呼呼地直喘气。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俩的模样象鬼一样。卡莱先生斜了他们一眼，然后瞪着眼睛朝孩子们扑了过去。孩子们见他这副样子，都

很害怕，纷纷跑开了。卡莱先生笑了，他把腋下的皮包夹稳，朝前走去。孩子们拍着手大声地嚷着：“卡莱先生大酒鬼！酒瓶碎了，瓶盖飞了！卡莱先生……”

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大声地骂孩子们。甚至往回跑几步吓唬他们。大家见他转过身来就赶紧散开，随后又跑到一块儿拍着手逗他，就这样，一直跟在他后面走了很远。

煤气灯下只剩下拉贾、沙密和诺夏三个孩子了。拉贾有些不好意思，他是这个居民区的孩子头儿，而刚才沙密让他在大家面前丢了脸。他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皱巴巴的香烟塞到嘴里，点上火，长长地吸了两三口，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卢比^①对诺夏说：“看电影去吗？”

诺夏高兴得眉开眼笑：“什么电影？”

拉贾朝沙密看了看说：“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巴格达窃贼’。我敢起誓，这是头等的好片子，特别有趣！”

诺夏想替沙密说说情：“不带沙密去吗？”

拉贾满不在乎地说：“我看呀，想去就说话，不去就滚蛋！”

沙密吼了起来：“要去就去，别提我的名字。我要回家，我可不像你们那样整夜在外面逛。”说完扭头就走了。

诺夏想叫住他：“哎！你先听我说。”

拉贾骂了一句：“让这小子走吧！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带他去了，这个狗杂种把我的脖子夹得好疼！”他慢慢地转动着脖子，脖子上还留着印痕。

两个人边说边朝电影院走去。

① 巴基斯坦货币单位。